第 5 卷第 5 期 2012 年 12 月

Vol. 5, No. 5, December, 2012

国 际 高 等 教 育

国际问题

腐败：国际化的挑战 175

国际化的五个真相 178

规范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的作用 180

后儒家时代知识经济的崛起 182

实施英语授课学位课程所面临的挑战 184

排名：永无结局的故事

当排名走得太远 187

中国国内的大学排名 189

高等教育国际化

中国的“国际海外分校” 191

中国学生的“留学热” 194

学术人员的国际化：基于博士后的研究 197

性别与国际科研合作 200

非洲的高等教育

融合与调适：非洲高等教育的一体化 202

非洲大学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 205

欧洲的高等教育

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学术界与历史的斗争 207

波兰高等教育体系：缩水和影响 209

荷兰应用科技大学的危机 211

爱尔兰高等教育愿景重建 214

腐败：国际化的挑战

Philip G. Altbach

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终身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altbach@bc.edu

腐败的阴霾一直笼罩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全球活动。一个海外学位变得越来越有价值，因此商业投机者在国际化领域找到商机也就不足为奇了。新的私立机构也加入了高等教育国际化行列，他们唯一的目标——赚钱。其中的一些机构是不值得尊敬的。一些学校在财政缩减的大环境下把国际化看成对财政“底线”的一种贡献。全球快速扩张的私立高等教育部门大多是营利性质的。在一些情况下，例如澳大利亚和英国，涉及到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家政策越来越倾向于以赚取利益为目的。

学术系统遭受腐败情况的国家正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际高等教育活动中来，如输送大批学生出国，与海外高校建立联系以及一些其他活动。腐败的问题并不仅限于那些还没有完善其学术实践的国家，而是一种全球现象。

最近美国媒体广泛报道了许多相关丑闻，包括一个名为“Tri-Valley University”的机构，这是一个招收留学生并收取学费，却未经过任何认证授权的假机构。这个机构不要求学生上课，反而在美国移民局的眼皮底下，将学生投放到劳务市场。另外，一些公立学校被发现招收学生的过程不符合学术标准。英国质量保证机构已经揭露了英国大学“特许经营”项目的问题，类似的丑闻也已经发生在澳大利亚。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les），英国第二大高校，在校学生人数达 7 万名，分布在全球范围内的 130 多个学院。学校不得不关闭其高利润的学位认证项目，这个项目的总收入高达全校收入的三分之二。

随着国际高等教育现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数十亿美元的产业，个人、国家以及机构都依靠收入、声望和准入通道等，腐败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对高等教育国际关系的廉洁问题无动于衷，那么建立在信任、共同理解以及学生和研究者利益之上的整个组织架构，其数十年建立起的承诺将要崩塌。这些都是它已经陷入困境的信号和标志。

实例与影响

一个严重并且还未解决的问题是，缺乏道德的留学中介机构和招募者将无资格的学生遣送出国留学已经成为一种流行的现象。英国的《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最近报道了一个案例，一个在中国的留学中介机构提供一些受质疑的服务，通过视频录像被抓获，所提供的服务中包括代写论文以及其他一些在申请英国名校时所需的帮助。尽管不断有新闻报道揭露这个问题普遍存在，特别是在那些输送大量留学生的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但是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无人知晓。毫无疑问，中介机构收到了大学支付

的高昂佣金，在一些更加过分的情况下，他们也从学生这里收取佣金。在诺丁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的例子中，通过中介机构入学的学生比例已经从2005年的19%提高到了 2011 年的 25%，这其中有多于一百万英镑的收入掉入了中介机构的口袋。

在国际学生录取工作中，伪造的假文件一直是一个问题。电脑技术更恶化了这个问题。文件造假已经成为世界上一些地区的小规模产业，许多学校不愿接受有不良记录的机构所提交的申请文件。比如，一些美国大学不再接收俄罗斯学生的申请，因为他们认为俄罗斯的学生普遍存在欺骗、贿赂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文件造假的势头越来越猛，以赚取佣金为基础的中介机构意图确保学生有出色的文凭来“包装”自己，因为他们的佣金需要依靠学生被好学校成功录取来赚取。因此，检查成绩单、推荐信和学位证书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成为越发艰难的任务。而提交有效文件的学生在这过程中会受到伤害，因为他们需要经受额外的检查。

例如篡改、伪造研究生考试以及其他一些国际入学考试成绩的做法，已经致使这些考试分数作废，甚至取消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考试资格，同时人们也开始反思在线考试是否真的实用。这些情况使得学生申请外国学校变得更为困难，也使评估入学学生的任务变的更为艰巨。

一些国家，包括俄罗斯和印度，已经宣称他们将使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和“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作为一种方法来认定国外大学所办学位的合法性、认定学术合作的合法性以及其他有关国际高等教育关系的合法性。很遗憾的是，这些排名主要衡量的是科研产出，因此许多优秀的学术机构并没有被包括在这些排名榜单之中。毫无疑问，俄罗斯和印度都很关心国外合作伙伴的质量，且发现这些排名很方便。

一些主要的留学目的地国家已经加强了法律法规，并针对不寻常及腐败的现象，更加严格地监督留学生的跨国流动情况。美国国务院（the US Department of State）已经在2012 年 6 月宣告，针对“Tri-Valley University”丑闻，印度的签证申请者需要经受额外的检查。早些时候，澳大利亚和英国已经修改了规则和政策。腐败问题已经导致高等教育国际化变的更为困难。也许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之下，欧洲大陆国家似乎很少受到腐败阴影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地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很少受到商业化与利益的驱使。

互联网已经成为学术造假和学术欺骗的“西大荒”。建立一个漂亮、吸引人的网站以及夸大质量或者对于机构的情况进行欺骗是很容易的事。一些机构所声称的资格认证其实根本不存在。甚至有一些“认证工厂”提供认证，只要学校付钱即可。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校园图片也只不过是对其他学校的图片进行修图而得的。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随着国际高等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商机，并且由于商业利润的促使，开展国际化活动的动机也愈发强烈，上述提到的问题可能将一直存在。

然而，一系列的方案可以改善这种情况。高等教育机构可以重新进行有关国际化作为传统“公共物品”（public good）的价值讨论，尽管在当前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紧缩的挑战下，使这类价值讨论变的更加困难。国际大学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近期发表的“肯定高等教育国际化中的学术价值”（Affirming Academic Values i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报告是一个好的开端。

资格认证和质量保障在确保基本质量方面是必要的。中介机构和国际高等教育组织必须确保大学经过严格谨慎的评价，并且确保评价结果是公众和国际利益相关者可以获得的。

政府、地区和国际各层面的中介机构必须调整他们的努力方向并且参与到维持标准和保护高等教育机构形象的行动中去。这中间充满矛盾。例如，美国国务院下属组织“教育美国”（Education USA）试图保护高等教育部门，但同时商务部（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却将高等教育视为一种出口商品。英国和澳大利亚的政府机构似乎也是主要在追求商业利益。

如何提高国际高等教育道德伦理的认识意识，如何提高对已出现问题和一直以来所面临挑战的意识，这些都是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在做抉择时，学生、家长、意图寻求交流和科研合作的学校和机构，以及其他的利益相关者都需要更为谨慎、警惕。

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的“腐败监测”（Corruption Monitor）是唯一一个搜集有关腐败信息的文献库；额外的信息资源和分析将会有所帮助。

解决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主要挑战的第一步就是认清这个问题本身。高等教育组织本身是绝不会统一的；愈演愈烈的商业化将使一些人勉强地做一些威胁利益的事情。学术组织中的一些人会想方设法使得问题行为变得合法化。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机构将遭遇灾难，并且向国际化进军的大步伐将受到威胁。

国际化的五个真相

Jane Knight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安大略教育研究院（the Ontario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兼职教授

电子邮箱：jane.knight@utoronto.ca

经过几十年的迅猛发展，高等教育国际化在视野、范围和价值等方面都有所发展。大学的战略计划、国家的政策陈述、国际宣言，以及学术文章都表明了国际化在当今高等教育领域的中心地位。

我最近的一篇文章，题为“五个关于国际化的谬传”（Five Myth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发表于《国际高等教育》第 62 期，2011），意图辨明关于国际化的一些误解。这些谬传对于国际化作为教育质量的标准、国际学生作为国际化代表、机构协议和国际认证作为国际化水平的指标，以及国际化作为在排名中取得高名次的策略等思想进行了争辩。

依靠并尊重地方特色

国际化承认并建立在国家和地区的特权、政策和实践上。对于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方面给予的关注不应该掩盖或者腐蚀地方特色的重要性。因此，国际化的意图是完善、协调并且扩展地方特色——而非主导它。如果这个基础性的真理不被尊重，那么极有可能在间隙中生出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国际化可能被看作一种均质的或霸权的中介。如果忽略了地方特色，国际化将失去它的本真和价值。

一个定制的过程

国际化是将国际的、跨文化的，以及全球性的维度整合进高等教育的目标、功能和传递中。同样地，它也是一个改变的过程，调整以迎合每个高等教育个体的需要和利益。因此，不存在一个“一体适用”的国际化模型。采用一系列“时尚流行”及“品牌主义”的目标和策略只是否定了一个原则，那就是，每个项目、机构或国家需要根据它自身清晰的理论基础、目标和预期结果来决定其实现国际化的途径。

利益、风险与不可预期的影响

国际化存在多种多样的利益，但是只关注利益就等于是无视风险和忽略不可预期的负面影响的表现。国际化学术流动中的人才外流就是不利影响的一个例子。现今人才流通的概念对于学术流动的威胁以及处在人才链底端那些国家所面临的激烈人才竞争是不予承认的。第二，对于国际化资格的渴望导致了“文聘工厂”（degree mills）的假文凭、双学位项目的多种证书，以及“认证工厂”（accreditation mills）的违法操作行为。第三，在一些国家，过度依赖国际学生的学费作为大学收入会导致更低的学术标准以及“签证工厂项目”（visa factory programs）的产生。第四，在一些地区，跨国的“特许经营”项

目及孪生项目日益增长的商业化和商品化一直在威胁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相关性。另外，最近的调查结果表明，高等教育领导者依然相信国际化的利益要超过风险。然而，对于国际化的不同影响，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有所警惕是必要的。

对它本身来说不是目的

国际化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方法，对它本身来说并不是目的。这是一个常见的被误解的惯例，会导致关于国际化内容和目的理解的扭曲。“-ization”的后缀表示国际化是优化和实现目标的过程和途径。例如，国际化可以帮助学生发展国际的、跨文化的知识、技能和价值观——通过不断完善的教与学、国际交流和课程，这些都包含了比较的、国际的、跨文化的元素。目标不是更多的国际化课程或增长的学术交流本身，恰恰相反，是确保学生能够更好地准备在一个更加连通的世界里生活和工作。理解国际化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方法而并非目的，可以确保国际化维度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被整合，并将其注入到教与学、科研与知识生产，以及服务社会这些高等教育的主要功能中去。

全球化和国际化是不同的，但却是彼此联系的

全球化关注世界范围内的思想、资源、人才、经济、价值、文化、知识、商品、服务和技术等方面的流动。国际化则强调国家、人才、文化、机构和系统之间的关系。世界范围内流动以及国家之间关系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显著的，也是深刻的。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已经积极地或消极地被全球化所影响，这两个过程从根本上是不同的，却又是紧密联系的。例如，日常的竞争和商业主义，经常与全球化发生联系，对跨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主要的影响。反过来，跨国教育的增长及其在双边和地区贸易协定方面的融合也加强了全球化的进程。

引导国际化的基本原则通常对于不同人才、机构和国家意味着不同的目标。然而，我们预测国际化应该会由基于合作、伙伴关系、互利互惠与能力建设的发展过程进化而来。现在，国际化已经越来越以竞争、商业化、利己主义、名誉地位建设为特点。更多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在探索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真相和价值上。

规范营利性私立高等教育的作用

William G. Tierney

美国南加州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高等教育政策分析中心（the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主任

电子邮箱：wgtiern@usc.edu

尽管私立非营利性高等院校在世界范围内拥有卓越而悠久的历史，但“以营利为目的的高等教育”（for-profit higher education）仍被认为是一个相对较新的事物。私立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如美国的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或巴拿马安提瓜岛的圣母玛利亚大学（Universidad Santa Maria la），都是历史悠久、声名显赫的高校。他们的关注点与意图相对明确，旨在关注或迎合传统“顾客群”，例如某一宗教团体的成员等。

即使非营利性高等教育由来已久，营利性高等教育在世界舞台上相对而言还是一个新来者。19 世纪，一些小型技术培训机构出现，旨在为个人提供职业技术的培训。相对较小规模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理发师、水管工、秘书以及众多其他行业的职业培训。这些机构的负责人一般不把自身当作公立或私立高等院校的竞争者。相反，他们为工薪阶层的学生们提供职业培训并以此获得微薄的利润。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教育机构逐步趋于正规化。职业演变为行业，并且为获得国家许可，学生可能需要通过相关考试或得到一定数量的学分才能获得证书。国家也可能会要求参与资格证书考试的学生同时具有高中或同等学历。这就致使小规模的营利性教育机构加设相关高中或同等课程，从而使学生获得高中同等学历。到 20 世纪 70 年代，营利性高等院校仍然寥寥无几。譬如说，1967 年，美国大约有 7 百万学生在高等院校就读学位课程，其中只有不到 22000 名学生就读于营利性院校。

但是，截止到 2012 年，美国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数量激增，已达到了 12%的市场份额。世界各地也都出现了同样趋势的增长。马来西亚同其他诸如土耳其和新加坡的国家一样，营利性教育机构数量增长迅猛。其中，相关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营利性增长

首先，教育企业家们抢得先机。约翰•斯珀林（John Sperling）博士于 1976 年创办了凤凰城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hoenix），是当今美国第二大高等教育机构，注册学生约 40 多万名。凤凰城大学与其他教育机构开始通过多元化的方式对高等教育的意义和目的进行实验探索。这些学校将兼职工作者视为庞大的潜在客户群。学校无需为这些学生提供校园和相关的配套设施，如学生中心、食堂等等。学生们可以选择的课程数量有限，但是课程时间和地点都照顾到了学生的实际需求，而不是未来工作方向不明确的“大杂烩课程”。营利性高等院校注重效率，其教师的工作也有所不同。学校几乎无需考虑教师任期，共同治理以及学术自由的问题。然而在传统的教育机构中教授需要编写教学大

纲，因此依照各个教师的意愿和计划，相同的课程也许会有不同的重点、目的和目标。营利性高等教育中的教学大纲是标准化的。每个班级的教学也大同小异。教育企业家们看到市场的苗头并抓住机遇，在实施的过程中已经重新定义了客户群及他们的需求。

增长的第二个原因是科学技术进步。在线学习（online learning）还不是最优化、最普遍的，但是我们常常忘记科技是如何在世界范围内被利用的。网络、互联网、YouTube，以及 Facebook 都是未知量，这些在十年前都是较为罕见的。技术的不断进步促进了课程的重新配置，这也是凤凰城大学创办时所不可想象的。营利性教育机构早期便采用了新技术，并通过此种方式来为自己开创新的市场。

高等教育是一个迅速发展的行业。重要的是，公立教育机构无法满足公民日趋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需求。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假设表明更多的教育促进经济增长。没有额外的收入来源，传统的公立大学无法满足产能需求以及传统意义上适龄学生与在职人士的需求，

增长带来的挑战

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激增带来了相应的挑战。尤其是，营利性教育机构被指控以不合乎道德的方式招生，为学生增添其无法接受的债务负担，并且不能为学生提供有利于其日后就业的必备技能培训。由于许多学生是家中的第一位大学生，他们可能不熟悉在营利性教育机构学习的花费情况，也无法想象为支付他们培训费用而申请的贷款可能带来的后果。招生顾问可能也会以虚假广告或不实的工作承诺来吸引潜在的消费者。

以上问题是令人困惑的，因为在营利性教育机构就读的学生通常最有可能面临无法完成课程的风险。一个国家希望更多的学生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然而政府希望增加的这部分学生从历史角度来看往往都是课程参与度较低、毕业率较低的学生。同样也是这群学生，由于无法达到与传统大学生同等的学业水平，他们可能会拖欠贷款。因此，如何决定可接受的债务负担水平以及毕业后的工资水平都是颇有争议的问题，营利性教育机构的批评者和支持者对此争论不断。

政府的职能是确保公民免受欺诈。正如政府监管卫生及食品安全一样，必须将相关法规落实到位以确保私营企业合规执行以保护消费者权益。就教育而言，单纯“买家注意”（“buyer beware”）的建议是一项不可接受的公共政策。教育是公共产品并且能使个人和国家都从中受益。因此，着眼于未来，建议国家应制定相应战略以确保营利性院校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这不仅有利于消费者，而且还有助于满足国家公民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

后儒家时代知识经济的崛起

Simon Marginson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教授,《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期刊编委

电子邮箱：s.marginson@unimelb.edu.au

东亚和新加坡的大学与科研发展在过去的 15 年中已完成了转型。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些高等教育机构正处于同英语国家与西欧国家共享全球领先地位的进程中。

关于亚洲知识经济崛起的言论不胜枚举，褒贬不一，但不是所有言论都是准确的。例如，东亚以外地区的教育与研究——包括印度和东南亚，要远远落后于东亚和新加坡。但是，这些国家正在不断进取，也在一些方面具备竞争实力，比如泰国和马拉西亚“顾客友好”型（customer friendly）的民办高校。

然而，中国大陆、香港地区、台湾地区以及韩国和新加坡的高等教育体系正在发生全球性的变化。这些教育体制采用日本的发展模式。作为世界第二大科研与新产品开发出资者，日本已经保持其科学与工程系统研究的前沿性与高参与度长达三十年之久。

科研带头人

东亚知识经济的动量指标是基于研究绩效与教育参与的数据而言的。除此之外，通过调查研究也能发现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笔者在最近完成的一项澳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资助的研究中，对亚太地区一流研究型大学的全球联系和产能进行了比较——包括该地区内 15 个不同高等教育体系下的 16 个案例研究。

案例研究中涉及到的大学有：东京大学，首尔国立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国立台湾大学，香港大学以及新加坡国立大学。它们都已发挥了重要的全球角色并拥有蓬勃的未来。

东京大学的学术论文产出量可以与除哈佛大学之外的任意一所美国大学相媲美。北京大学处于中国高校的中心地位。在论文产出量方面，浙江大学处于领先位置，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紧随其后。基于不同指标显示，国立台湾大学是中国目前的顶级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其有效的全球战略和伙伴关系著称。香港大学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内研究水平最突出的五所大学之首。就拥有担任美国“财富”（Fortune）500 强企业行政总裁职位的校友数来看，首尔国立大学世界排名第五。

后儒家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以上高等教育体系存在着许多差异，但是他们都可以追溯至共同的中国文化根源。新加坡具有多元化的文化要素，但中国对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儒家思想对家庭教育义务的深厚影响促进了各国教育体制的形成，奠定了教育质量的理论基础，并确保参与进展与学生学习进展之间相契合。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对 15 岁青少年学习成就的调

查，即“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中，这些国家均位于世界前列。

无论是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比如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的国家和地区，只要国家拥有强而有效的国家机器，致力于投资教育及科研，确保投资到位并最终实现目标，便会由此获益。这些国家中，日本由于早期活力的逐步消散，投资逐渐趋于平缓。后儒家高等教育体系是传统与西方科学的显著结合，它们正在引领东西方现代教育体制的新融合。

目前东亚与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在以下三个方面实现了飞速发展：各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很高，如台湾地区和韩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经超过 85％；从世界标准来看，一流大学教育质量突出；研发增长迅猛，课税及政府开支较低。以上成就均得益于经济增长。除中国大陆地区以外所有国家的财富都已达到西欧水平。据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的统计显示，2010 年韩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per head）为 29010 美元，香港为 47130 美元，新加坡 55380 美元，日本 34780 美元。

中国崛起

2010 年，中国大陆地区人均国民总收入仅为 7570 美元，但这个数字在过去的五年内已翻了一番；北京、上海及部分东部地区相对富裕，国内具有不均衡性。高等教育入学率计划于 2020 年达到 40%，这项比率在 1990 年仅为 5%。地区差别仍将是一个持续性问题。

中国计划到 2010 年将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用于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目前，科研支出已达到美国水平的 40%。在过去的十年中，中国年均学术论文增长率为 17%。

中国的研究轨迹存在一定问题。国有企业的相关研究很多，然而高校的却相对不足。问题产生于研究补助决定权的行政干涉，以及中国高校内部活跃辩论与社会言论自由的不匹配性。中国的刊物出版数的增长与其高引用论文数的增长也尚未匹配。

但是中国的研究成果实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诸如化学、工程、材料等领域，中国均领先于世界水平。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物理和数学领域也发展较好。生命科学与医学是发展相对薄弱的学科。

总的来说，东亚研究型大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根据荷兰莱顿大学（Leiden University）的统计数据，从亚洲与西太平洋地区 2005～2009 年学术论文产出量来看，18 所高校共产出 5000 多篇论文，并且在各自领域论文引用率占前十名的论文数至少占总数的 10％，其中中国和澳大利亚各有 6 所大学上榜，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各 2 所，日本和韩国各 1 所。然而在欧洲和美国对应的数量分别为 47 所和 64 所。

但是，不得不看到，亚太地区的大学共产出 5000 多篇论文，学术论文的引用率也在不断提高。由于研发投资的持续增长，后儒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有望成功。

实施英语授课学位课程所面临的挑战

Annette Bradford

美国华盛顿特区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教育政策研究项目（Education Policy program）博士生

电子邮箱：acb83@gwu.edu

为了积极应对全球化，提高各国高等教育体系的竞争力，很多非英语国家正试图增加部分或者全部用英语授课的学位课程数量。欧洲诸国大学，尤其在荷兰以及北欧国家，很多年前便已经开始实施英语授课。但是，对英语授课的实施及其质量的担忧依然存在。世界其他各地的大学，尤其在东亚地区，正在加紧步伐增加英语授课课程的数量，他们也将面临类似挑战。

英语授课课程的数量不断增加

随着 2010 年博洛尼亚进程中“三级学位体系”（the Bologna-process three-cycle system）的实施和完成，非英语国家英语授课课程的数量已大幅增加。国际教育学院（th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2002 年采用全英语授课的硕士课程只有 560 个，2008 年倍增到 1500 个，到了 2011 年多达 3701 个，此外还有 963 个课程将英语作为授课过程中使用的语言之一。目前，比荷卢经济联盟国家（Benelux countries）以及北欧国家的硕士课程几乎全部采用英语授课。相比之下，本科阶段全英语授课的学位课程数量的增长率没有如此显著，但亦呈增长之势，仅荷兰一国便向欧洲本科生留学信息平台数据库（the bachelorsportal.eu database）上报了 200 多个英语授课课程。

最近几年，东亚地区各国大学也已经开始加紧步伐增加英语授课课程。韩国表现出了对英语授课的极大热情，大量高校试图将英语融入现有课程中，现有课程中至少有 30％用英语教授。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则更加注重全英语授课。台湾地区至少有 170 个不同程度的英语授课的课程；日本政府计划在 2014 年之前在受“全球 30 万留学生计划”（Global 30 Project）资助的 13 所高校里打造 157 个英语授课课程。在教育部的要求下，中国大陆地区的各个大学也出现越来越多的专业课程开始实施全英语授课，包括信息科学、生物技术、新型材料、工程学、国际贸易、金融学和法学等专业。

英语授课面临的挑战可以分成三大类，即语言、文化以及课程结构等方面的挑战。

语言挑战

在非母语环境中工作学习，人们担忧的是教师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学习质量。即使那些有着悠久英语教学历史国家的学生，如挪威和芬兰，在英语授课的课堂上也有词汇量不足以及笔记难作等烦恼。其结果是，教师们必须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课程，这难免影响到一个学期所授课程的质量和进度。

教师语言表达能力的欠缺也严重影响了英语授课课程的质量。大部分欧洲学生认为他们的老师缺乏口语表达技巧，从而失去了

对教师所掌握的学科知识的信心。教师们也认为，如果语言问题妨碍他们自由表达或者难以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表达，课堂将变得枯燥且机械生硬，难以将自己平生所学倾囊相授。

文化挑战

实施英语授课课程的高校正在向更多样化的学生和教师群体开放，而这些学生和教师则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拥有不同的期望。这些不同又渗透在英语授课的各个层面，对课堂表现、课程考查方式以及教师评估等都产生了影响。一些教师已经习惯了教授来自同一文化背景的学生，那么他们就可能面临挑战，因为他们可能缺乏跨文化知识，而这些知识本身对于教师引入国际化课程内容、采用更为包容的教学方法、促进互惠的文化理解等意义重大。在实施英语授课的过程中，这些语用能力（pragmatic ability）比语言的熟练度更加重要。

很多学者认为，由于教师很难将英语和其主导文化相隔离，同时也由于这些课程中对于国际透明的要求，往往英语授课就导致了课堂和问责行为的“美国化”。这在亚洲各大学的课堂上将是一大难题，因为亚洲各国的传统教学强调师严、师尊，而大部分国际留学生却可能来自于亚洲。

语言和文化挑战加剧了英语授课课程带给老师们的负担。例如，评估数据表明，一名日本教授使用英语进行授课比使用母语需要多付出 4～5 倍的努力，而台湾地区的研究也披露了教师们对于准备一门适合多样化学习风格的课程所需时间的不满。尽管丹麦和荷兰的教授们拥有很高的英语交流能力，然而他们也不愿教授英语授课课程。教师们的这些负担可以通过雇佣母语为英语的老师来减轻；但是在聘用和保留海外教师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往往需要支付大量的额外薪资才能吸引到更多更优秀的海外教师；再者，由于就业管理和签证的限制，很难长期聘用海外教师。

课程结构挑战

课程结构挑战指的是课程实施和管理所带来的问题。除了要找到合适的教职工之外，实施英语授课课程的高校还必须扩展自己的管理和辅助服务，以迎合多元化的国际留学生以及海外教师队伍。参加英语授课课程的留学生通常要比其他的当地学生需要更多帮助，尤其在住房、学分互换，以及学术和宗教咨询等方面。而在很多国家，其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并非专业出身，且任职于一个职位也不会超过几年。因此，很难聘用到满足任职要求的行政人员。

实施英语授课课程所面临的另一个课程结构问题是学校内部的不妥协。跨国或者国家倡议，如欧洲的“博洛尼亚进程”以及日本的“全球 30 万留学生计划”推动了英语授课课程的实施，但是决定这些课程能否顺利实施的则是高等学校的利益相关者。如果没有这些利益相关者的支持，如教授委员会、教师等，那么英语授课课程不可能如期实施。

解决策略

为了促进英语授课课程的有效实施，高校应该注重解决上述三大挑战。对学生和教师的有效支持可以包括为学生提供语言及学术技巧课程，为教师们提供跨文化教学技巧课程等。台湾地区各高校正在积极采取上述措施以应对挑战。国立台湾科技大学为本地学生提供免费暑期英语强化训练，使学生能够高效地参加英语授课课程；国立彰化师范

大学鼓励教职工积极参与教学研讨会（pedagogical workshops）；类似地，元智大学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合作，将教员送到澳大利亚进行强化训练，使他们能够更加高效地使用英语进行授课。为了积极应对挑战，实现高效的英语授课，高校应该调整管理规范，包括对行政管理人员、教师聘用等的调整。

当排名走得太远

Phil Baty

英国《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副主编

电子邮箱：Phil.Baty@tsleducation.com

政府在试图识别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越来越多地依赖世界大学排名。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最近签署了一份文件，官方认证 25 个国家的 210 所一流大学所颁发的学位证书，而这 210 所大学的选定主要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为依据。1000 名受俄罗斯总额为 50 亿卢布（约 1.52 亿美元）的“全球教育计划”（the Global Education Program）公费资助的留学生也必须进入这些一流大学深造。

与之相似，巴西总额为 13 亿英镑（约 20 亿美元）的“科学无国界”计划（Sciences Without Borders Program），即 10 万留学生派遣计划，也主要依据《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以及其他世界大学排名选取海外留学高校。本月，印度的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ies Grants Commission）制定规则确保只有进入《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以及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的 500 所大学方能与印度高校联合办学。当然，这些对《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的官方高度认可是令人欣慰的。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的排名方法

《泰晤士高等教育》自 2004 年以来每年都会推出世界大学排名，但是随着此排名的影响越来越大，我们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才能使排名研究承受得起头上的光环并担负起肩上的重任。所以，在全面审视过去的排名研究之后，我们于 2009 年拆分了过去五年里使用的排名体系，一切从新开始。我们丢弃了之前过度简单化的排名模型，采取了全新的排名指标，推出了全新的世界大学排名。

首先，我们邀请到一位新的数据合作伙伴——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与汤森路透达成一致，并和来自各大洲 15 个国家的 50 多位专家，经过 10 个月的公开讨论和咨询后，我们为新时代高等教育全球化制定了一套新的排名体系。令人欣慰的是，此次改革为我们带来了最全面最系统的排名体系之一。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所有核心任务——科研、教学、知识转移（knowledge transfer）以及国际交流活动等都纳入评价体系的排名。它是唯一一个利用绩效指标全面反映每所学校学科专业的排名，并妥善权衡了艺术、人文、社会科学专业，而这恰恰是其他的全球大学排名未能考量到的。《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的声誉调查只发送给受邀的专家学者，其中没有任何志愿者、更没有高校的自荐。

的确，我们的排名已经收到了多方称赞。我们很高兴看到一位排名评论者、美国波士顿学院的访问学者丹尼尔·林肯(Daniel

Lincoln)最近这样说道，“贝蒂和《泰晤士高等教育》以他们的公正和诚挚而闻名。”

警告

但是只有对世界大学排名的合理应用以及滥用进行公开诚挚的讨论，公正之美誉才能获得并保持。几乎全部的世界大学排名及其方法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排名将大学及其多样化的任务和特色浓缩为一个简单的分数。因此，任何人如果过于机械地使用排名，就可能会错失被排名忽视的或者没有完全被排名捕捉到的大学中各学科专业的卓越内涵。

例如，所有的世界大学排名都强调对科研能力的评估，而此种评估主要依据被国际知名刊物收录的论文数量。这无疑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兴研究型大学不利，因为研究成果的发表很多时候是一种国家或区域行为，当然对一些以教学为主的学校不利。

全球高等教育的特色之一是其惊人的多样性，但是由于每一个排名都有着一套具体的评价指标，所以任何排名都不可能很好地、全面地评估大学的多样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拉丁美洲大学各大学联合发表的新宣言理应受到关注。

此宣言在莫斯科国立自治大学（the National Autonomous University of Mexico）举办的长达两天的会议上获得通过，其主题是“拉丁美洲大学和国际排名：影响、范围和限制”。该宣言还表达了对多数决策者以及公众认为排名是完全公正的担忧，因为没有哪一种大学排名是详尽或客观公正的。

此次会议聚集了来自 14 个拉丁美洲国家的 65 所高校的校长和高层管理者，呼吁决策者避免将排名用作评估大学绩效、拟定高等教育政策、决定高校财政资助数额以及对高校及学者进行奖赏和激励的唯一指标。

公开公正的排名当然能够有效地衡量高校的绩效。排名能够帮助学生选择适合的大学，帮助教职工作出正确的职业抉择。排名还能够帮助政府更好地理解在知识经济背景下高等教育大众化所面临的政策挑战，并将自己最好的研究型大学的表现与其他竞争国家进行比较。再者，排名还能够帮助政府为本国的高校选择潜在的合作伙伴，决定将奖学金投放到哪里等。

但是，只有当我们这些做排名研究的人坦诚排名不是万能的，坦诚排名能够评估什么以及无法评估什么，并且鼓励人们不要停留在表面的分值，而是更加深入地探索各个领域“卓越”表现的真正内涵时，那么排名才能发挥积极作用。

《泰晤士高等教育》正在努力扩大其发布的大学排名范围，并对排名结果进行更多详尽的分析。排名对全球高等教育可以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评价工具，但是一定要小心处理。

作者注：本文的早期版本被刊登在《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里,但已获得许可在本刊发表。

中国国内的大学排名

刘 进、沈 红

刘进：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在读博士生，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的访问学者

电子邮箱：liujinzju@gmail.com

沈红：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兼副院长

电子邮箱：hongshen@gmail.hust.edu.cn

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闻名于国际高等教育领域。但是，此排名与《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世界大学网络计量学排名”（Webometrics ranking)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世界大学排名在中国国内的影响，都没有中国国内的大学排名来得深刻。

中国每年有超过 9 百万名中学生报名参加高考，以升入大学就学。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国内的大学排名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于美国的是，在中国，学生一旦选定了大学，便几乎不可能转学到其他高校。大学的选择决定了一个人的生活及未来，为此，选择大学成为对数百万家庭至关重要的一件大事。在择校的过程中，大部分家庭关注中国国内的大学排名，世界大学的排名对大多数家庭影响较小，因为只有少数的中国大学能够进入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中。

四大主要排名

1987 年，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the Chinese Academy of Management Science）公布了国内第一个大学排名。在此之前，我国社会各界并不大关心大学的排名，因为我国的大学间少有竞争。从那以后，我国已经出现了 17 个富有影响的大学排名，其中 7 个或已暂停，或已取消。尽管每一种排名都宣称自己的研究是非营利性的，其研究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但也不乏一些排名研究通过出售排名书刊，或者通过制定发展计划协助大学来谋取利益。目前，在我国有四大富有影响力的中国大学排名。

“网大中国大学排名”是由中国网大有限公司于 1999 年组织发起的，该公司宣称其排名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学生选择大学。除了排名的指标和权重不同，网大的排名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the US News & World Report ）中所刊登的美国大学排名的理念基本一致。

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的大学排名是由武书连发起的，并且包含了对许多分类指标的子排名，如教师绩效和研究绩效。其目的是通过估量大学主要功能的实现来评价大学对社会的贡献。该排名有两个一级指标（即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四个二级指标（即研究生培养、本科生培养、自然科学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以及 33 个三级指标（如本科毕业生就业率等）。这三种指标分别被给予了不同的权重。

中国校友会网排名的大学排名是由中国校友会网发起的，其目的是衡量高校的学术

潜力和对社会的贡献。这是中国第一个将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分开进行评估的大学排名。中国校友会网的大学排名采用了三个一级评价指标（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综合声誉），七个二级评价指标（科研基地、科研项目、科研成果、培养基地、师资队伍、杰出校友和社会声誉），以及 9 个三级评价指标（科学创新基地、基础科研项目、重大科研成果、杰出人才、师资水平和学科水平、国家定位、校友捐赠以及媒体关注）。除了综合排名之外，这一排名体系还包含了一些特殊分类，如中国大学的校友捐赠排行榜、中国大学被《自然》（Nature）和《科学》（Science）期刊录入的论文排行榜。

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大学排名是由邱均平及其武汉大学的研究队伍组织发起的，其排名目的是评估大学的竞争力。该排名的基本理念是将大学分成三类：重点公立大学、一般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对于不同类别的大学，其评价指标也是不同的，这就意味着此排名有着相当可观的评价指标群（indicator pool）。例如，重点公立大学的评价指标包含四个一级指标（教育资源、教学水平、科学研究以及大学声誉），13 个二级指标（如教育资金等），以及 50 多个三级指标（如总校区面积等）。

除了上述大学排名以外，中国还有一些影响力较小的排名研究。如中国人民大学侧重于对重点大学的排名研究，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公布的《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侧重于研究大学的投入和产出比。

方法和数据库

中国国内大学排名的方法基于建立一个多维的评价指标体系，权衡每一种评价指标，分析数据并且运用度量学分析研究结果。尽管学者们在每一个排名研究中都尽力仔细审查、精细计算，但是大多数学术观察员依然认为这些排名只不过是排名发起者与执行者的个人主观臆断，而不是严格的科学研究。

同时学术观察员对这些排名的数据来源也提出了质疑。在上述四大排名中，有两大排名研究是由企业组织发起的，一个由大学主办，还有一个排名是由一所非营利性机构发布。四大排名中没有一个是由政府机构主办的，这使得研究难以获得一些数据的使用权。在中国，大部分重要数据常为政府所据有。而大多数排名的数据都是第二手来源，主要包括网络、报纸、杂志和书籍等。更糟糕的是，这些信息经常被凌乱地拼凑在一起。例如在广东管理科学研究院 2011 年的大学排名中，一些数据来源于 2010 年，而其他一些数据却收集于 2008、2009 年。

结语

中国国内大学排名的存在与某些需求有关：学生需要大学排名作为择校的参考依据，而高校为了吸引优秀生源、引入科研经费，必须提升自身的排名。此外，排名的发行者也有谋取利益的需求。

中国国内的大学排名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已经促进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高校盲目地追逐大学排名的标准来定制自身改革，难免出现问题。例如，排名对科研成果这一评估指标的过度强调，已经诱发了近些年来海量论文的“发表潮”。那些坚持不扩招的大学在中国的大学排名中难以持久占有一个好的席位；再者，对评价体系自身的质疑之声亦有高涨之势。

中国的“国际海外分校”

David A. Stanfield、王 琪

David A. Stanfield：美国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国际高等教育中心（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研究助理

电子邮箱：david.stanfield@bc.edu

王琪：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电子邮箱：qimwang@sjtu.edu.cn

目前两所英国高校在中国大陆建设分校，美国的两所著名大学也将很快在中国建设分校。这些国外高等院校旨在通过建立海外分校复制本校一流的教育，从而引发了广泛关注。由于中国独特的大环境，这些机构可能会“水土不服”，并在实现其目标上面临许多挑战。

海外分校的特征

由于中国教育部有相关规定称，外国教育机构必须与中国当地的高校合作，形成法律上的合伙关系，才能开设分校；因此，中国境内的“国际海外分校”与众不同。尽管已有约 20 所国外高校在中国建立海外分校，但是大多数规模较小，仅提供一至两个学位项目，招生数也相对较小。相比之下，有四所海外分校力图提供一系列本科生以及研究生课程，旨在体现其校本部的质量和经验水平。宁波诺丁汉大学是英国诺丁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与浙江万里学院合作创办的非营利的中国第一所海外分校，目前拥有超过 5000 名学生。西交利物浦大学（XJTLU）是英国利物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Liverpool）同美国营利教育机构桂冠（Laureate）合作创办的，拥有 3200 多名学生。还有两所美国名校的分校正在建造之中，他们分别是：昆山杜克大学（Duke Kunshan University）（同武汉大学合作创办）；上海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同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创办），两所分校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全面开放。

尽管中国教育部要求这些学校对其办学内容进行适当修改以获得国家认证，但是这些海外分校还是作为独立的实体创办并采用国外合作学校的教材和组织结构。举例来讲，办学机构必须开设一门有关中国文化的课程并遵守国家入学准则；同时，西方机构提供的人文教育是一种体制内全新的尝试，力图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意识以及企业家精神。除此之外，这些海外分校还计划利用当地合作高校的杠杆优势致力于研究工作。

未来潜力：世界一流教育？

国际著名高等教育专家萨米博士（Jamil Salmi）在《世界一流大学：挑战与途径》（The Challenge of Establishing World-Class Universities）一书中提到，世界一流大学人才聚集，资源丰富并且管理得当。这可以作为检验中国的海外分校未来潜力的一个有力框架，看其是否成功复制了校本部的教育经验。

人才 世界一流的教育体系都需要高素质的学生和教师。海外分校依赖于同校本部

相似的入学标准，包括论文写作、高中成绩单以及面试。在中国，高考成绩也被纳入考核标准。这一系列的入学要求将有助于海外分校选拔高素质的学生并维持高水平的教育质量。然而，是否会有足够数量的高素质学生申请还不确定。这些大学在其本国招收高素质申请者的能力可能无法在中国的分校中体现。中国的精英大学由于其学位在当地就业市场的感知价值，因此很容易招收到最优秀的学生。此外，在一个依赖于人际网络的社会中，学生们普遍相信国内一流的公立院校将有助于为其建立获得最高薪资及最受追捧工作的必要关系。尽管西方海外分校拥有国家声誉和认可的品牌效应，但是希望在中国工作的学生们可能还是会更愿意获得国内的一所精英、公立大学的学位。除此之外，即使国外高校机构明确声明学位要求和课程设置完全同与校本部相同，学生们通常仍旧会认为分校的质量稍逊一筹。

世界一流大学也需要高水平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西交利物浦大学和宁波诺丁汉大学皆面向国内外招收全职的长期员工。但是，事实上海外分校通常难吸引校本部的员工到国外任教，这是由于已经承担的研究和教学任务、移居国外的种种问题以及任职和晋升制度的不兼容性。为吸引顶尖师资，海外分校必须提供优厚的薪金待遇，充足的科研基金以及其他福利——例如在一个不断增长的动态经济中的工作机遇。然而，报告称外籍教授和研究人员基本能够参与中国当地的研究基金申请，这无疑也是一种保障。

资源　虽然未披露全部细节，但是可以看出中国境内海外分校的财政收入是由当地或省级政府、中国的合作大学、民营企业以及学生的学费构成，来自学校本部的财政投资相对较少。据报道，上海纽约大学已谈妥了一系列的财政支持，纽约大学校本部的投入资金相对较少。相反，据报道昆山杜克大学为其启动和规划费用贡献了数百万美元。

宁波诺丁汉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以及上海纽约大学的学费范围大致从 6 万元到 13 万多人民币不等。宁波诺丁汉大学和西交利物浦大学的学费低于英国，然而据报道纽约大学和昆山杜克大学将收取同纽约及北卡罗来纳州校本部金额相近的学费，并提供一定的财政补助和奖学金政策。相比之下，中国顶尖公立大学的学费在五千元到六千元不等。自然而然，高中毕业生及其家长将会三思而后行，才会考虑读海外分校。然而，同出国留学不断增长的开销相比，选择在分校念书是一个价格合理的替代品。同时，我们也发现，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可以负担得起送子女出国留学，那么如果有机会，大多数家庭可能还是更倾向于选择出国留学。

额外的收入来源，如知识产权、伙伴关系以及来自校友和基金会的私人捐赠，在中国皆处于起步阶段，需要时间来培养。发展世界一流的教育和科研需要大量资金，并且海外分校能否确保得到充足资金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管理　西方的高等教育依赖于促进自治、学术自由以及自由探究的管理结构，这种标准可能会与中国的要求以及当地合作伙伴的期望发生矛盾。例如，教育部规定分校的校长必须为中国公民，这将会导致其无法完全掌握西方的教育理念和领导风格。此外，尽管政府承诺给予高校更多课程事务的管理自主权，但政府近来对质量保证的高度关注可能会导致额外的监管。基于当地法律和文化的敏感性，对于西方机构最重要的学术自由可能无法得到保证。海外分校能否创造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必需的治理模式，还拭目以待。

结语

位于中国的海外分校希望通过提供西式

教育，跻身中国高等教育的前列，吸引到高素质的学生及教师，并致力于科学研究工作。虽然中国特有的制度赋予了其一定的潜在优势，但是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诸多挑战。

中国学生的“留学热”

查 强

加拿大多伦多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教育学院副教授

电子邮箱：qzha@edu.yorku.ca

近来，有关中国高等教育的广泛讨论主要集中在两个现象。一是中国留学生呈现低龄化趋势。在 19 世纪 80 年代，大部分中国留学生主要学习研究生课程，到了 90 年代后期主要以学习本科课程为主，现在越来越多的留学生就读于高中课程。据估计，目前高中生占中国留学生总数的一半甚至更多。可以理解的是，这些学生选择在高中阶段便出国留学是为了将来更容易、更顺利地进入并融入西方大学。另外一个突出现象是对提高、保证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呼吁，比如国家重要的教育政策文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刚要（2010～2020）》对此进行了强调，教育部于 2012 年 3 月 22～23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上也对此进行了探讨。对以上两种现象一起进行讨论，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近年来高等教育不断扩招，但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仍然选择留学。

日益下降的教育质量

中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着实令全世界大吃一惊，但是为什么中国学生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海外留学呢？相比 10 年前，中国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显著提高，18～22 岁大学适龄人口毛入学率也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不到 10%上升到 2010 年的 26.5%。在城镇地区，高等教育入学率要更高一些，超过 50％的高中毕业生能够进入大学学习，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总的来说，自 1998～2010 年，中国高等教育的入学率以年均 46.2%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留学生的数量平均年增长速度超过 25%。2009 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数量相比 1999 年增长了 80%。

2011 年，中国留学生人数创下 33.97 万的新高。预计到 2014 年留学国外的中国学生数将达到 55～60 万。此外，留学生群体还呈现出低龄化趋势。在过去的五年里，进入美国私立高中的留学生人数增加了 100 倍，从 2006 年的 65 人增加到 2011 年的 6725 人。长此以往，再加上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在未来 10 年内，18～22 岁的大学适龄人口预计将减少约四千万），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源可能会受到威胁。目前，中国留学生每年为外国经济做出的直接贡献超过了 150 亿美元（其中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约 46 亿美元），相当于 2008 年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的一半。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变得富有，但是仅仅这一个因素还不能充分解释与日俱增的“留学热”。事实上，像中国这样，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与留学生数量并肩齐增的事例是很少见的。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严重下降了，这也许是另外一个导致“留学热”的重要原因。自 1999 年中国高等教育扩大招生以来，对教育质量下降的担忧和批评之声不断。自 2005 年以来，高等教育的扩招规模大幅度收缩，与此

同时，改革焦点以及教育资源被逐渐转向解决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公平问题上。而著名科学老将钱学森提出的“钱老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大学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则大大加速了高等教育改革。鉴于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刚要（2010～2020）》强调了要重视全面提高并保障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了在采取措施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进程中，要稳固大学的入学增长率（实现未来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增长集中在职业教育、专业研究生以及私立大学上）。

努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在召开“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工作会议”之前，中国政府还发布了另外两个重要文件，指示将实施具体的计划并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文件之一是《高等教育发展战略规划》（由教育部公布，作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刚要（2010～2020）》中高等教育相关部分的实施计划），该文件通过实施一系列大规模建设计划，强调了保证高等教育的质量是重中之重，这些建设计划包括大学教师发展及课程开发、学生的创造力教育、创造性专业课程开发，研究生课程改革等，以及进一步实施“985 工程”和“211 工程”，以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另外一个政策文件是由教育部与财政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实施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的意见》，该文件启动了“2011 计划”（该计划的制定受到了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上所发表讲话的指引），通过推动高校间、高校与科研机构、企业以及区域发展需求间的深度合作，充分发挥并提高中国大学的创新能力。中国政府已经投入资金以推动并支持上述合作。

这些努力能缓和“留学热”吗？

这些政策也许将在一定程度上留住一些中国学生。但是，这些政策和计划主要基于人力资本（以及功利主义的政府工具论）的视角，将高等教育视为提高国际竞争力（就政府而言）和社会地位（就个人而言）的有益投资。该观点将大学视为政府用来发展国家教育和科研的工具，并将知识的创造和传递与国家的发展进程紧密接合。随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这种接合导致了高校的垂直分化。在这一分层结构里，政府只资助处于顶端的大学，以此换取高深知识创造并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学生，以保证中国在知识经济时代持续繁荣；然而，处于分层结构底部的大部分大学则被推入了市场浪潮。这些政策反过来加剧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激烈竞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强调为生存进行资源竞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盛行并主导了社会生活。大学文凭对个人取得竞争优势至关重要。如果一个人不能进入较好的大学，则意味着输在了起跑线上。理所当然地，如果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学生就可能会另谋留学之路，并相信西方大学学位能够提高其竞争力。近些年来，香港地区的大学开始受到中国内地学生越来越多的亲睐。过去 10 年中，到香港地区读本科的内地学生人数增加了 129 倍，从 1997 年的 36 人增加到 2010 年的 4638 人。无可厚非的是，香港地区的大学有着更加自由的学术氛围以及更强大的国际师资力量。

需要明确的是，高等教育不仅能够创造人力资本，也能够拓展人的能力。除非中国的高等教育能够营造一种环境，在这一环境中，学生能够全面开发自己的潜能并且能够

过上与自己的需求和兴趣爱好相一致的多产的、富有创造性的生活，否则试图逃离这一充满紧张感和竞争环境的人只会越来越多。按照目前的情况看，越来越多的人群似乎正在加入这一“逃离大军”。尽管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随着“逃离人群”的扩大，人才流失难免成为中国的一大难题。自 1978 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近 230 万中国学生及学者出国留学。截止 2011 年底，超过 140 万人仍然留在国外。

学术人员的国际化：基于博士后的研究

Brendan Cantwell

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助理教授

电子邮箱：brendanc@msu.edu

学术人员的国际化进程，相比高等教育其他方面的国际化，推进得更为缓慢。在大多数国家，绝大部分学术人员都是来自本国，在创建跨国学术生涯的道路上也存在着巨大障碍。但是，至少在职业初期阶段，博士后人员的国际化也许是学术人员跨国流动增长的一个标志。目前，大量青年科学家与学者离开本土或长久居住地，到他国从事博士后工作。但是，博士后流动并不意味着全球学术劳务市场变得“平坦”（flattening）。该流动的方向大致从南半球到北半球，从东半球到西半球。在评价博士后的国际化时，我们需要考虑驱使这些流动的因素及其背后的意义启示。

对博士后国际化的界定

不同学科、不同国家以及私立院校对博士后的定义是不同的。但也不乏一些共同之处。博士后通常指的是处于职业初期阶段的学者，在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受聘在高等院校或科研机构从事一定时期的研究工作。博士后致力于研究，可以理解为处于学术生涯最后准备阶段的高级学员。但是，人们可能会夸大博士后工作的学习培训成分。博士后是学术研究的前线人员，并且对科研事业贡献巨大。

国际博士后经历可以定义为，在本土或长久居住地之外的早期学术生涯研究工作。除了欧盟内部的博士后流动，国际博士后学者一般都需要工作签证作为聘用条件。现在很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成员国的博士后国际化日益增多，但该趋势最为显著的也许还是美国：在近 6 万名从事博士后工作的人员中，大部分都是临时工作签证持有者。

对博士后国际化的解释

推动博士后国际化的因素之一是科学的全球化。以网络为媒介的科学交流和在线学术期刊的广泛获取都促进了科学知识的进一步融合。于是，来自不同国家研究型大学的毕业生掌握了相当的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很多国家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张以及发展，尤其是中国，显著地扩大了当今世界潜在的“博士后群”。此外，研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问题也不无存在。简而言之，西欧以及北美洲国家提供更多的博士后工作机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合格毕业生为这些工作机会展开了激烈地角逐。

另外一个可能推动博士后国际化的因素是学术生涯中的海外经验变得越来越重要。目前，海外学习和工作经验被视为学术工作中促进智利开发和专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点在欧洲尤为突出，欧洲各国积极鼓励学者在学术生涯早期参与跨国交流。而在美国，初级学术研究人员并不被鼓励到海外工作，使之成为博士后国际化流动标准的一

个特例。

教授以及知名学者也热衷于参与全球竞争。现在要想聘用到最优秀的博士后工作者就意味着要放眼全球劳务市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教授们定期聘用国际博士后学者。但是这些国家的学者，很少有人愿意在学术生涯的初始阶段到发展中国家从事博士后工作。

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正在经历着从“政府直接资助型”转变为“准市场资助型”（quasi-market funding models）。相关例子包括：各国基于科研产出、卓越计划以及其他竞争性资助机制的财政拨款，此类财政资助相较于政府的常规整体财政拨款呈增长之势。由于这些财政拨款为期较短并且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更有助于学校招聘临时工作人员，比如博士后学者，而不是长期的学者和工作者。再者，就全球范围内的永久性学术职业岗位而言，学术研究人员似乎供过于求。很多刚刚步入学术界的年轻学者完成了一系列博士后工作，并不是因为他们希望如此，而是因为这是他们能够在学术劳务市场找到的仅有机会。

各国移民政策的改革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日趋增多的博士后国际化现象。许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重新调整移民法规和政策，优先吸引高技能工作者，如访问学者和移民。在某些情况下，这意味着聘用国际学术人员的法律门槛降低了。欧盟成员国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劳务市场。包括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在内的国家，在发放工作签证时，优先考虑高学历获得者。虽然美国的政策近年来被认为对移民工作者不利，但是美国对大学引进人才并没有如此苛刻。

对高技能移民有利的移民政策似乎激励着一些青年学者到国外从事博士后研究。一些处于学术职业发展初期的学者，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常常将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从事博士后研究视为长期移民的第一步。在北美或者其他欧洲国家从事博士后研究的欧洲学者有时候也会移民。这些情况往往被称为“偶然性”移民，因为这些学者移民是由于一些偶然机遇，而非本身有策划的移民行为。虽然用“零和”（不得利即失败）的概念来评价学术流动和移民显然过于简单，但无庸置疑的是在人才的国际化流动浪潮中，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

机遇和挑战

博士后国际化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青年学者的跨国流动可以促进不同思想的交流，知识的融合以及跨文化、跨国的互相理解。所有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并且能够间接地带来其他一些积极结果，比如促进开展对世界更多地区的科技和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

博士后国际化趋势面临着一些严峻的挑战。尽管没有充分的反映博士后流动的全球数据，但是博士后流动的不平等问题是显而易见的。而不平等的流动可能会导致某些国家的人才流失。再者，尽管青年学者的国际流动是有利的，但是也不乏弊端。学者们不停地从一国迁移至另一国进行博士后研究，久而久之可能会有成为“永久博士后”（perpetual postdocs）的风险。这也许与当代的以灵活、短期、问题指向性为特征的学术研究的理想模式相关，但是该模式并不适合稳定的学术生涯的发展。另外，还存在着对国际博士后工作人员的剥削问题。本人针对美国和英国高校的国际博士后研究经历的调查发现，这些国际博士后学者经常过度工作

且缺乏资助。

结语

博士后国际化也许是学术人员国际化趋势的一个航向标。决策者、高校领导者以及高等教育研究者将继续评估博士后学者以及其他学术人员的跨国流动。他们也将充分利用跨国学术研究工作的优势。当然，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目前和将来的学术流动会催生出怎样的全球学术不平等以及会对博士后学者产生怎样的影响。

性别与国际科研合作

Agnete VabØ

挪威北欧教育创新及科学研究院（the Nordic Institute for Studies in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Science）副院长

电子邮箱：agnete@nifu.no

随着高等教育逐渐“产业化”，大学和国家为了获得优秀人才、交换学生以及科研合作展开激烈竞争，高等教育与科研的国际化也越发重要。此外，国际交流活动对个人学术生涯的发展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008 年展开的一项基于国际科研项目的调查“变革中的学术职业”（the Changing Academic Profession），揭示出美国学者，尤其是女性学者，与国际同行进行科研合作的比例非常低。鉴于国际合作与科学竞争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世界各国为了紧跟国际化步伐所做的各种努力，如“欧洲研究区域”（European Research Area）的建立等，美国的低比例国际合作现象着实令人吃惊。

在美国，只有 28%的女性学者以及 37%的男性学者与国际同行进行科研合作。相比之下，在英国，此比例分别高达 53%和 69%；德国亦有 43%的女性学者以及 52%的男性学者参与国际科研合作。

世界上国际科研合作女性参与率最高的国家是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芬兰、意大利、挪威、葡萄牙以及英国。在拉丁美洲，阿根廷，巴西以及墨西哥等国家，参与国际科研合作的男性和女性学者的比例均低于 50%。

性别与国际化

在某种程度上，国际科研参与率上的性别差异反映了各个科学领域里存在的固有差异，这种差异以国际合作以及发表创作模式为基础。相比人文学科以及社会科学等偏感性且拥有更多女性学者的学科，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等学科领域则以更多的国际合作和成果发表为特征。

然而，“变革中的学术职业”调查所发布的数据表明，之所以会产生国际合作参与率上的性别差异，也与学者的婚姻状态、配偶的职业状况以及是否为人父母等因素有关。调查显示，配偶工作稳定且有孩子的女性学者，参与国际科研合作的可能性比男性学者（无论有无孩子）和没有孩子的未婚女性学者都要低。

国际化职业要求长期而又频繁的异国出差，这和传统的女性与男性的劳动分工不相兼容，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何女性学者在其本国内的国际化活动更加积极。对很多女性来说，国际化的职业路线似乎不太合理。“变革中的学术职业”调查数据也发现，与男性学者相比，更多的女性学者是单身状态。

“进口”和“出口”知识

就知识共享而言，学者通过发表科研成果、参加国际会议以及参加国外学术交流一直处于国际化状态。正如“变革中的学术职业”研究调查所揭示，学者们也经常通过教授他国学生以及开设国际研究项目等途径，

参与国内的国际化活动中。

美国作为一个拥有健全的学术体系的国家，在各个学科和研究领域，有很多卓越的研究机构，因此，美国自然是一个重要的学者和学生“进口国”，而非“出口国”。鉴于北美洲拥有着众多著名大学，其国际化活动并没有像在欧洲国家，尤其是一些欧洲小国那样受到重视。再者，校际流动是美国学术工作者传统职业发展中的一部分。与很多欧洲国家相比，美国人普遍认为，博士毕业后申请的第一份工作不应该在其毕业的院校里。

国际流动的障碍

促成传统性别角色的因素也与各个国家学术职业结构的一些显著特征相互作用。不论教育还是科研发展，有些学术体系是“性别隔离”（gender segregated）的，例如，在墨西哥获得博士学位的女性比例很低。在一些拥有“终身教授”（tenure-track system）体制的国家中，例如美国，女性学者出国发展要比继续留在国内发展更具风险。

有人认为，“终身教授”体制总体上阻碍了美国学者的国际流动。同时，学术职业生涯也常常呈现泛用临时职位的特征。这就意味着在美国，把握好学术生涯的关键阶段尤其重要，这决定了一名学者能否成为一名有影响力的研究者、教师或者导师。因此，留在国外发展是一种有风险的行为，尤其对女性学者来说，因为到国外发展就意味着失去了参与国内竞争以及终身任职的机会。

我们不应该低估这些特征对国际合作的限制作用以及对各种潜在合作利益的阻碍作用。更大范围的国际化不仅能够扩大合作基础，增添异国学术氛围，为研究团队注入新鲜血液，并提供数据支持，而且还能带来更多的科研资助机会。

融合与调适：非洲高等教育的一体化

Karola Hahn、Damtew Teferra

Karola Hahn：埃塞俄比亚阿迪斯阿贝巴大学（Addis Ababa University）建筑、土木构造与城市发展研究院（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Building Construction and City Development）执行主任，“调适非洲”计划（Tuning Africa）指导委员会成员

电子邮箱：karola.hahn@eiabc.edu.et

Damtew Teferra：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非洲高等教育国际网络（the 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Africa）创始人，“调适非洲”计划指导委员会成员

电子邮箱：teferra@bc.edu

非洲高等教育的融合是一个推动该地区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多维度过程。其旨在，在课程发展、教育标准、质量保障、结构整合、教育体系一致性以及学位的互通、转换和互认等方面，促进跨国、跨地区的合作，以期推动该地区人才的流动性。

非洲联盟委员会（the African Union Commission）推动了非洲高等教育的一体化进程。欧盟委员会通过“非洲－欧洲联合战略合作”项目（Africa-European Union Strategic Partnership）支持一体化进程，其中包括“非欧联合移民、流动与聘用合作计划”（Africa- European Union Migration, Mobility, and Employment Partnership）和“非欧联合战略行动计划”（Joint Africa-European Union Strategy Action Plan）。过去的三十年里，非洲采取了各种行动推动一体化进程，其中最为著名的要属 1981 年制定的“阿鲁沙会议惯例”（Arusha onvention）和 1997 年签署的“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教育培训协议”（the SADC Protocol on Education and Training）。“阿鲁沙会议惯例”正在修改中，它将成为非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法律框架。

“调适”：开拓性举措

“调适”（tuning）举措，即推动合作与咨询的战略，是高等教育改革中提升教育、教学和评估质量的一种复杂方法。它指导着课程发展、学分累计机制以及学分转换系统，从而实现预定学习目标、获得技能并提高能力。“调适”的目的之一是确保不同国家的学者能够在通用技能和学科专业技能方面的参考标准达成一致。

作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重要工具，“调适”举措在欧洲已经发展起来了，特别是自博洛尼亚进程（the Bologna process）实施以来。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已经有 60 多个国家完成了“调适”计划，包括欧洲、拉丁美洲、俄罗斯以及美国等。最近，澳大利亚、印度和中国也开始实施“调适”举措。1000 多个大学、部门、机构以及其他组织参与了这些计划。“调适非洲”举措（Tuning Africa）是非洲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中的重要部分，以促进非洲地区高等教育的融合与改革。

一体化工具

“调适”举措是促进非洲高等教育融合

的有效工具，其重要性最早在政治层面上受到关注。欧盟委员会于 2010 年开展了一个可行性研究，探索该举措的预期结果、相关因素与合时性等问题。在可行性研究与广泛咨询的基础上，“调适”举措展开了一系列试点项目。与很多单一的“自上而下”政策计划不同，非洲的“调适”举措则采取了双重作用模式，将“自上而下”（最初使用的方法）与“自下而上”（后来发展起来）两种方法相结合。

2011 年 3 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举办的验证研讨会（Validation Workshop）确定了五个优先试点领域，包括农业科学、土木工程、机械工程、医药和教师教育，试点项目将在这五个领域中协调开展。

试点计划

加入“非洲高等教育融合与调适”（Harmonization and Tuning African Higher Education）的呼吁开始于 2011 年 10 月。在 2011 年 11 月，选拔研讨会在达喀尔举办，紧接着举办了名为“调适、学分、学习效果与质量：对教育融合和非洲高等教育空间的贡献”的国际会议。该会议的参与者包括非洲联盟委员会、欧盟委员会、非洲大学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African Universities)、非洲与马达加斯加高等教育委员会（the Conseil Africain et Malgache pour l’Enseignement Supérieur）、东非大学委员会（the Inter-University Council for East Africa）、南非高等教育委员会、非洲远程教育理事会（the African Council for Distance Education）、国家质量监督机构（如南非质量监督局以及国家教育部）等。

选拔研讨会对 96 个申请大学进行了筛选。但是并不是所有入围的大学最终都能被选取，研讨会正在实施进一步措施，以最终确定参与试点的 60 所高校名单。

主要问题

所有权、包容性与领导力 “调适非洲”举措最早由区域融合、流动以及和谐等政治信条引发。该举措在实施的初始阶段，难以避免产生对所有权、包容性、领导力和策略等问题的担忧。为此，各界同意在实施计划之前首先要进行可行性研究。

由于“调适”过程会涉及很多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如管理者、政府部门、高等教育以及质量监管部门、决策者、雇主、公共部门、学生、区域性组织、中介人员以及大学联盟等，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持续相关咨询是必要的。

现在“调适”举措迎来了一个新阶段，非洲大学联盟被设立为非盟委员会下的执行机构。在该阶段，非洲大学联盟通过促进并保证大学间对话的自主性，以此推动非洲大学间互惠咨询、公开透明、高效的合作对话。

连贯性、一致性与宣传性 广为接受的“调适”举措涵盖了一系列全国性、区域性任务，包括：质量监管、资格认证、文凭框架设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的制定以及课程改革等。此外，需要确保这些计划相互关联、紧密协调，并且保持前后连贯、衔接一致。

在非洲高等教育体系中，“调适”这个概念仍然是一股新气象。只有 60 所大学参与非洲高等教育“调适”举措的试点计划，其中也包括非洲地区一小部分顶尖大学，以及政治、中介机构。因此，制定一个适当的宣传计划使一体化进程为大众熟知并接受是必要的。

资源 实施“调适”举措需要一定的资源。由于大部分非洲大学经历了长期的财政

紧缩，资源的调配仍然须经过许多选区的协商。“调适”举措能否顺利实施还可能会受到高校间基础设施水平存在差距与高校人力资源基础薄弱等问题的阻碍。

结果导向型学习:可行性问题 从投入导向型教学（input-oriented teaching）向结果导向型学习（outcome-oriented）的成功转变（包括能力测评以及质量监管体系等的相应转变），是非洲“调适”举措面临的关键挑战。高等教育的迅速扩招、资源缺乏、管理和领导不善、教职工水平低下以及生源问题等都将严重影响该举措的实施。因此，必须根据实际，制定适当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以促进试点计划的成功实施。

远程教育在非洲高等教育扩招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在将远程教育融入高等教育主流的过程中，试点计划起着引导作用。但是，到目前为止，远程教育还未被纳入试点计划。

结语

“调适非洲”举措的试点计划将是一个广泛征询意见的过程，通过举办大量的研讨会和会议，促进国家间的基层对话。这将促进对话平台的建立，监管教育质量、提升教学以及改善教学评估等。由于学分问题以及统一的学分制度是“调适”举措中一项重要内容，试点计划也可能会进一步推动非洲学分制度改革。

试点计划的成功将取决于一批大学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充足的资源、有效的宣传，以及透明可信的领导管理。该试点计划与当前的质量监管计划（包括地区性和全国性的质量认证机制）间的直接联系和融合将推动可持续的、制度层面的有效改革。

非洲大学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

Sarah Hoosen、Neil Butcher

Sarah Hoosen：教育科技领域的研究者

Neil Butcher：非洲“教育技术计划”（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itiative）“高等教育合作伙伴”（Partnership for Higher Education）项目负责人

电子邮箱：neilshel@nba.co.za

在非洲地区，随着通讯费和接入设备价格的大幅降低，信息通信技术为越来越多的人接触、使用。各种全国性、区域性以及大陆性的组织机构承认信息通信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以及非洲大陆的重要性。很多国家致力于制定国家信息通信技术政策以及基建计划，以支持其相关的社会经济发展。

通过大学自身的资助计划和捐赠者资助计划，在大学层面上已经展开了大量工作。“高等教育合作伙伴”项目旗下的“教育技术计划”（Educational Technology Initiative）于 2008 年开始实施，旨在促进非洲高校间信息通信技术的融合。该计划倡导教学活动应该促进科学技术继承使用，并推动协同知识创新和传播。

该政策同时也重点发起并维护基于学生学习经验和学习结果的教育技术计划。来自于六个国家的七所大学参与了“教育技术计划”：乌干达的马凯雷雷大学（Makerere University）、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the University of Dar es Salaam)、尼日利亚的伊巴丹大学（Univeristy of Ibadan）和乔斯大学(Universities of Jos)、肯尼亚的肯雅塔大学（Kenyatta University）、莫桑比克的的天主教大学（Universidade Catolica de Mocambique）和加纳的温尼巴教育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ducation）。管理该计划的经验为信息通信技术在非洲大学中的应用与发展提供了借鉴。

促进教学

在非洲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信息通信技术被用来应对以教师讲授主导的传统课堂所面临的各种教学挑战，包括大班教学、多语种、读写能力训练和理论与实践如何结合等问题。伊巴丹大学启动了一个发展计划，旨在拓展大学教职工探究数字信息并将其高效地应用于教学的能力。马凯雷雷大学已经着手为课程开发“电子内容”（e-content），并启动“电子档案计划”（e-portfolios project），试图将电子档案引入教学评价体系。

除此之外，非洲大学也越来越多地使用以“在线学习”、“混合式学习”以及“网助式学习”为特色的学习管理系统。分析显示，对学习管理系统的投入，包括发展教职工和学生高效使用学习管理系统的能力等，是保证在线学习有效进行的关键。但是，调查分析也指出参与学校存在的几个能力鸿沟：缺乏维持信息通信技术系统的专业技术人员；能将科技应用于教学的教师数量有限；教学人员严重依赖于以授课内容为导向、刻板机械的教学方法论；在制定教学计划上缺乏经

验等。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教育技术计划”还提出了一系列能力拓展训练，并随着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训练重点和内容。入门能力训练具有很强的引入性，逐步加深内容，比如如何在教学中既能使用仿真、动画以及视频教材，同时又能顾及教学质量的提高。然而，由于缺乏对在线学习的质量保障与提升机制，如何保障教学质量面临重要挑战。或许使用“对等网络”（peer networking）能够提高在线学习的质量。

其他挑战

将信息通信技术融入教学过程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障碍是教学人员缺少应用教育技术的动力，甚至缺少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经历的动力，因为对于教师评价和激励主要基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发表。再者，虽然教师对于科研成果发表极为重视，学校也强调了“教育技术计划”，但是对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仍然没有得到重视。“教育技术计划”表明非洲的很多大学缺乏有效开展在线学习相关研究的能力。这一挑战与下列因素有关：管理人员缺乏科研经验、由于其他工作职责没能给予科研足够的重视、缺少相关研究兴趣等。为此，可以采取进一步措施以拓展有关在线学习的研究能力，可以通过提供相关支持和给予学者更多科研实践等方式途径。

缺乏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是能否全面应用教育科技的最大障碍。网络宽带速度不够、能源供应不稳定等基本问题，也严重地限制了相关大学在线学习的增长潜能，并且经常扰乱开发工作、科研以及其他相关活动的正常进行。然而，非洲已经开展了一些改善措施，比如继海底电缆的成功安装后，东非和南非地区的宽带连接范围不断扩大。再者，信息通信技术在非洲高等教育领域的成功应用越来越显著，这可能会鼓励政府、国际合作伙伴和大学自身继续投入、关注信息通信技术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应用。

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学术界与历史的斗争

Gregory Androushchak、Maria Yudkevich
Gregory Androushchak：俄罗斯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学院(Higher School of Economics)院长顾问
电子邮箱：gandroushchak@gmail.com
Maria Yudkevich：俄罗斯莫斯科国立高等经济学院副院长
电子邮箱：yudkevich@hse.ru

为什么后苏联时代的大学教师聘用合同与工作内容（甚至包括研究型大学教师）重教学而轻科研？导致重教学轻科研的历史因素早已被肃清，但是从现在俄罗斯公立大学来看，已根深蒂固的经费资助模式助长了这种重教学轻科研的势头。这与近年来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制度有关。只有修订教师聘用合同，制定倡导重视科研的政策，才能改善俄罗斯大学的综合表现，无疑这对俄罗斯的高等教育体系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

过去的资助计划余影

在过去前苏联的时期，大学的经费资助基于高度计划的经济模式。国家计划委员会（the Gosplan）通常颁布文件，阐述经济应该如何发展，从而国家可以在各方面都领先；政府部门则计划各行各业所需职工的人数。据此预算出各级各类学校应该招收的学生人数，其中包括职业学校，即中等职业培训机构（相当于美国两年制的社区大学）。

虽然苏联模式早就不存在了，但是很多后苏联国家直到近来还在应用此计划模式，只是国家计划委员后来以“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代替了原先的“计划”模式，这些高素质人才则需要大学来培养。这样的情况下，苏联时代大学以学术能力录取学生，但在很多西方学者和观察家看来，其本质并非如此。一些经历过该段历史的高校官员提供了有力证据，证明当时的学生录取模式只不过是删减报考大学的人数，而非真正为了优化生源。而国家对大学的拨款资助也没有把学生质量因素考虑进来。最重要的拨款资助标准是按照学校的在校人数来划拨。没有按照计划招满学生的大学，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政府计划的招生人数会减少，随即其受到的国家经费资助也会减少。

自 1992 年以来，大学获得许可在计划外招生。当然，这些计划外学生必须自己承担学费。然而，俄罗斯青年都非常渴望上大学，以至于他们只希望能够进入大学即可，而不是按自己的兴趣爱好寻求高质量的求学机会。也就是说，其他国家所经历的优质生源竞争在俄罗斯并不存在。

于是，大学失去了吸引、聘用最优秀教职工的动力。由于缺乏提高教育质量的动力，再加上国家划拨的生均经费过低，这些问题都加剧了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动荡。

情况继续恶化？

20 世纪 90 年代末，俄罗斯大学面临着另一场灾难。1991～1993 年的经济危机几乎击垮了国家的整个经济，致使就业机会基本都集中在原油开采和零售业。然而，由于国家计划部门的错误计划和预测，大学仍然以

为它们应该注重培养工程师。因此，学生毕业寻找工作时便发现，如果按照他们大学所学专业找工作，几乎没有对口的就业机会。很多学生，尤其是大城市的学生由于无法学以致用，变得消极倦怠。这种情况也使得大学失去了积极进取之心，不再竞争优秀的生源、聘用顶级师资。

自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大学教师就渐渐远离科研，科研任务主要由科学院承担。结果很多高校成了纯粹的教育机构，以教学为主要职责。教师的聘用合同上明确地描述了教学责任与义务。再加上研究成果不受重视、教学负担重，学术界普遍缺乏进行科研的动力和机会。

在进行教师工作绩效评价和学校评估工作时，科研产出几乎不做考量，包括每位教师发表论文数以及参与学术会议的情况等。而在院系或者学校内部发表论文（一般没有同行评议过程）对于校外评估学校的科研质量和教师表现等也不起到任何作用。

缺少校外评定机制阻碍了学术流动和交流。教师被紧紧束缚在自己所就职的大学里，几乎与其他领域隔绝。在学术生涯的早期阶段，教师注重发表创作，但是在取得一定的成果后，他们偏向于竞争稳定且收入又高的行政岗位。这导致了大部分高校的管理体制等级化、官僚化，而学术团体在决策的制定上缺少发言权。

可以做些什么？

总的来说，国家资助机制对大学的方方面面（包括教师聘用合同以及科研与教学质量）影响巨大。希望在未来几年里，高校的发展形势会有所改变，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乐观发展迹象。首先，高等教育市场已趋于饱和。2008 年高达 80%的俄罗斯高中毕业生进入大学学习。学生需求从只要进入大学学习，转向要进入一所特定的大学、特定的领域求学。这种有自主意识的学生至少占高中毕业生的四分之一。第二，俄罗斯人口结构的变化，17-18 岁的大学适龄人群大量减少。最后，值得关注的是，大学适龄人群的紧缩部分超过大学的招生计划人数。这种情况迫使大学不得不为了获得生源展开竞争。

有远见的高校领导者们已经看出了学校将要面临的生源挑战，并着手制定市场竞争策略，展现自身院校的优势——主要是优秀的师资以及卓著的教育质量，来吸引学生。为了提高教育质量，高校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既要有资金条件也要有非资金条件，以吸引多产的、稳定的教师队伍，改善学术氛围。

怎样才能改善学术氛围，吸引更多学生呢？首先，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大学招录系统需要改革。政府的资助不仅要与学生数量紧密相关，但是还要考虑到高校质量的高低。第二，恢复重点大学的科研功能。最近几年，俄罗斯教育与科学部（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Science）出台了一系列大学拨款计划，支持发展基础科学研究、促进产学研合作。第三，学术体系应全力参与国际学术市场，并聘用国际学术人才。

然而，教师的聘用合同是学术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虽然目前很多后苏联国家的教师聘用合同仍然受到过去“重教学轻科研”思想的影响，高校的改革呼声高涨，高校在各方面的改革步伐和改善已初见端倪。

波兰高等教育体系：缩水和影响

Marek Kwiek
波兰波兹兰大学（Poznan University）公共政策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 Studies）
教授及主任
电子邮箱：kwiekm@amu.edu.pl

波兰的高等教育入学率预计在不久的将来会呈现欧洲范围内最高幅度的下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针对波兰的情况做了两种发展战略预计。第一种预计，2025 年波兰高等教育入学率预计降低至 2005 年的 55%，学生数减少将近一百万（约为 94.7 万）。第二种预计，基于趋势，入学率将会跌至 2005 年的 65%，学生数减少约 80 万（约 77.5 万）。在其他欧洲各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人口结构的变化都没有导致学生人数发生类似的骤降。预计学生人数将从 2010 年的 182 万降低到 2015 年的 152 万，再到 2020 年的 125 万。

波兰高等教育入学率的下降将同时影响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部门。如果公立高等教育部门依旧依靠税收为经费支持基础，那么主要受影响的就会是收费教育项目。目前，只有公立大学全日制学生受到税收支持，非全日制学生均为自费生。由于私立大学仅招收自费生入学，因此人口结构变化对其的影响预计比公立大学更为严峻。

因此，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公立学校数量的减少和/或公立学校收取学费的可能性。如果公立高校不收取学费，那么公立大学全日制课程项目的入学率将保持在现有水平——2020 年的在校学生数将与 2010 年一致，约为 85 万人。如果公立大学收取学费，那么公立和私立学校以及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学生的数目都将减少——到 2020 年全日制课程项目的学生数约为 55 万人。如果公立大学不收取学费并且继续扩招，那么 2020 年公立学校的全日制课程项目入学率将会提高，比如学生数将会增加到 100 万。如果在 2011～2020 年期间招收学生每年增长 2%，那么公立大学将在十年后提供 1 万多个入学名额，这些入学机会也是公立大学扩招下学生们的“首选入学机会”。因此，在以上所说的三种假设情况中：第一个预计中，私立大学到 2020 年的招生数可达 25 万人，第二个预计为 45 万人，第三个预计则仅为 10 万人。实际上，2010 年，私立大学的招生人数为 58 万人。

对私立大学的影响

政策的影响是惊人的：波兰拥有全欧洲最大的私立高等教育部门（2010 年，高等教育在校人数为 182 万，其中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数占 31.8%），并且严重依赖于作为其竞争者的公立大学是否征收学费。如果公立大学不全面收取学费，那么私立大学的规模将会严重缩水 60%或者更多。如果公立大学收取学费，入学率仍将下降到现有水平的 75%。因此，因此，让公立大学收取学费可能是私立大学最为有效的生存战略。公共经费的引进是私立大学未来最为有效的生存战

略。个别私立大学的战略作用远小于公立大学资金机制的宏观变化能起的作用。在未来十年人口下降的情况下，维护以税收为经费收入基础的公立大学对于私立大学来说意味着灾难，除非公立与私立大学得以兼并。招收留学生至关重要，但是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10 年留学生的份额不到 1%）。尽管在 2008～2010 年政策制定者与高等教育界对此进行了集中公议，但在 2011 年 3 月出台的新法律中仍未加入征收学费的相关条例。

政治因素

尽管在未来十年中波兰的人口因素可以预测，然而政治因素无从猜测。后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未来几年的政策选择。一个政策立场（即政治经济改革派）是主张维持原样——即不引入学费机制。关于高等教育费用方面的新法规暂时维持现状。一个尚不明显的且更具争议的政策立场则主张实行干预，尤其是通过改变融资安排来实现。

根据不断减少的人口结构，维护私立大学的合理政策干预可以只涉及私立大学（对私立大学全日制学生的教学公共补贴：2010 年私立大学中全日制学生约为 11 万人，占私立大学全部学生数的 17%），或仅涉及公立大学（引入学费机制），或者两者都涉及（两种策略的组合）。波兰校长会议（Polish Rectors' Conference）所强烈支持的公立大学引入学费机制的想法，在理论上看似合理，但是在政治上可能比较复杂；目前正在为这两个政策干预措施游说议员，并预计将持续下去。由于人口因素可以预估，因此无法预测的政治因素对于未来整个波兰的高等教育体系尤为重要。

长期衰落

从全球视角来看，波兰的私立高等教育具有特殊性。招生的份额在逐渐下降，与此同时绝对入学率也在下降。预计在未来的十年中每年的入学学生数会越来越少。波兰高等教育体系目前拥有 325 所私立大学，2010 年的学生总额约为 60 万人。波兰现在面临着如何在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缩水的时代背景下建立起公平的公共政策的挑战。在后共产主义时期的欧洲，私立大学入学率短期出现下降趋势在过去十年中确有发生，但是波兰的情况显然不同。

与中欧和东欧其他国家相反的是，波兰目前和预计的缩水将是长期的，而非短期有限。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部门都会受到影响。涉及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间动态发展的主要政治因素是需要公立大学引入学费机制。波兰何时能为这些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做好准备，以及如何将私立大学生存的问题列入主要的政策问题来讨论，这些都尚未知晓。在当前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引入学费机制可能存在政治困难。到目前为止，对于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人口危机影响，公众与学术界仍然缺乏认识、意识浅薄，公众看到的只是养老金和卫生保障体系的方面。在人口缩水的时代，人口参数必然将成为必要的新型公共政策之一。

荷兰应用科技大学的危机

Hans de Wit

荷兰阿姆斯特丹应用科技大学（the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in the Netherland）高等教育国际化教授、意大利米兰圣心天主教大学（the Universit à Cattolica Sacro Cuore in Milan, Italy）高等教育国际化中心主任

电子邮箱：j.w.m.de.wit@hva.nl

荷兰应用科技大学正面临着各家媒体和政客们就学校表现的强烈抨击。茵河伦德应用科技大学（the InHolland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是一所规模较大的应用科技大学。它于 2010 年遭遇了有关媒体与娱乐管理专业学士学位的丑闻：学校向未达合格要求的学生授予学位以提高毕业率。同时该大学的管理委员会也因过度宣传而受到质疑。2011 年，斯特登高等专业大学（the Stenden Hogeschool）由于四个国际分校在授予学士学位时违反部门规章要求而遭到谴责。同年，温迪斯恒高等专业大学（the Windesheim Hogeschool）由于新闻学学位质量问题受到抨击。2011 年底，阿姆斯特丹应用科技大学（the Hogeschool van Amsterdam）的经济管理系所授予学位的质量遭到质疑。上述所列举的只是学校主要丑闻事件的一部分而已。

荷兰应用科技大学的主要问题在于学位质量，包括对于学位证书造假、高辍学率和低毕业率的控诉。要理解荷兰应用科技大学当前表现欠佳的原因，必须把它们置于荷兰高等教育改革和全球知识社会要求的情境中。

像其他欧洲国家一样，比如奥地利、比利时、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一些国家，荷兰的高等教育执行的是双轨制（a binary system），它由研究型大学和应用科技大学组成。和其他国家相比，荷兰应用科技大学在学生数量及高等教育机构数量方面皆高于 13 所研究型大学。在荷兰 60 万名高校生中，40 多万学生分布在约 40 所的应用科技大学中求学。

并校与大众化

在过去 20 多年间，荷兰应用科技大学经历了一个并校高潮，400 所应用科技大学缩减了 90%。大学合并是基于学生数量增长而研究型大学却不扩招的情况下开展的，旨在维持专业教育质量和缩减成本。并校举措的开展导致巨型大学的出现，有些巨型大学的学生数量已经超过 3 万。

学生数量在同一时期增加了一倍。经济和管理类在 40 年前还是小型学科领域，现在成了发展最快的专业（占学生总数的三分之一），所有的专业都面临着潜在学生数量增长的情况。

应用科技大学主要提供本科生教育，即四年制学士学位项目，主要是在商业管理、护理和其他专业领域内授予学士学位。研究型大学的三年制学士学位项目与之不同，主要是授予艺术、科学学士学位。尽管应用科技大学能发展硕士学位项目，但需要学生自费学习，同时也不具备与研究型大学精简的、

高质量的硕士学位项目竞争的实力，最终导致应用科技大学的硕士学位项目几乎不存在。

截至 20 世纪 90 年代，应用科技大学的声誉一直还很稳固。这些应用科技大学向社会输送受过卓越职业训练的毕业生，来自各个专业领域的高质量师资提供相关教学和培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应用科技大学能提供研究型大学不能替代的教学项目（艺术、护理、社会工作等），这些项目仍在国内甚至国际上享有一定知名度。

大学的合并和学生数量的快速增长被认为是应用科技大学目前存在压力的主要原因。这些当然是相关因素。同时，高校不断扩大中间管理层级也是受到抨击的对象。在过去的 20 多年间，应用科技大学缺乏创新可能是更加严重的问题。英国把科技专科学校升格为新大学；在德国、丹麦、挪威这些国家，应用科技大学不仅会在应用研究、硕士学位项目，甚至是博士学位项目上投入经费支持，也会在提高师资水平方面进行经费投入。在荷兰，高校的合并和大众化已经花费了大学的所有精力，几乎没有给高校留下创新的空间。荷兰应用科技大学只有一半的教职员工拥有硕士学位，不到 3%的人拥有博士学位。这与德国和北欧国家存在很大差距，在这些国家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教职人员拥有硕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的教职人员占 20～40%之间。2001 年，荷兰应用科技大学决定招聘教授职位的教师，并发展应用研究。然而这些应用科技大学的作用和规模相对较小，并且与教学科研方面分离的时间太长以致不能发挥有效作用了。

高质量专业人员不足

荷兰的专业领域和国际认证机构越来越多地要求毕业生不仅要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还要具有更强的分析能力、反思能力——换句话说，学生必须拥有更多更强的专业技能来适应全球知识社会。学校课程和教职人员还不能满足这种发展需求。同时学生背景的多元化，包括第二代移民学生数量的增加，给学生增加额外压力。辍学率和延期毕业率逐年增加。最终导致荷兰应用科技大学面临来自政府的双重压力：提高毕业率和提高毕业生质量。由于学校的资金资助基于毕业人数，学校项目管理者和教职人员也感受到学校领导施加的提高毕业率的压力。双重压力导致学校丑闻事件的增加，特别是允许未达到毕业要求的学生毕业以提高毕业生数量的报道不断增多。

高毕业率和教育质量之间的矛盾

一方面，教育管理者和教职人员感受到让学生毕业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也要注重培养自己未接受过的专业训练。应用科技大学的领导层以及政府就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也面临巨大压力。对此，已经设定了到 2016 年所有的教职人员必须具有硕士学位的目标——如果这不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也是很有挑战性的目标，因为很难花时间精力并投入经费来实现这个目标。同样，在课程中为研究和方法训练提供更多发展空间的计划也在进行过程中，但是这需要教职人员具备不同类型的技能而不是是否有教职人员的问题。

其他国家的应用科技大学较早地并且越来越逐步顺应专业领域的要求。相较之下，荷兰应用科技大学却处在一个困难时期。这需要把更多的时间和经费投入到应用科技大

学现代化的进程中去，而这些所需要的时间和经费是政府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所无法提供的。荷兰高等教育的忧患可能是：荷兰应用科技大学和研究型大学与其他国家大学的差距越拉越大，这种趋势会对学校一些优势学科产生消极影响。学校的丑闻和对假造文凭的控告虽然不会持续下去，但并没有对学校发展带来任何益处。高等教育不能忽略严重的教育质量问题，由于其多年来一直未顺应知识经济的所需而进行改变，该问题难以解决。

爱尔兰高等教育愿景重建

Ellen Hazelkorn

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学院（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负责产学研的副校长、研究生研究院院长、高等教育政策研究组主任

电子邮箱：Ellen. hazelkorn@dit.ie

在过去的 40 年间，爱尔兰经济发生了巨大转变。随着其加入欧盟、加快金融投资市场的国际化与市场化，爱尔兰由前工业时期的贸易保护经济模式转变为后工业时期的高科技经济模式。爱尔兰地处美国和欧洲之间，成为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国家。截至 2000 年，爱尔兰成为世界第二大计算机软件出口国，仅次于美国，同时是拥有世界前 10 强制药公司的国家。“凯尔特虎”（Celtic Tiger）经济繁荣时期，爱尔兰成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快速发展的领先国家。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爱尔兰成为经济衰退的典型国家，直到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洲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这“三驾马车”（troika）的援救。如今人们把爱尔兰描述为财政紧缩政策的伟大试验或成功案例。

爱尔兰高等教育的扩招反映了这些变化的发展。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前，除了政府严格执行的欧洲教育双轨制外，爱尔兰高等教育的发展很少受到政策引导和监管。爱尔兰实行的双轨制即综合性大学满足传统教育（classical education）要求；技术类学院主要是满足区域性、中小型企业的要求，提供以职业为中心的教育。爱尔兰还有少量其他教育机构，比如营利性大学以及发展不协调、不知名的继续教育机构。如今爱尔兰有近 40 所高等教育机构，满足 19 万名学生的需求——预计到 2020 年学生人口总数将会上升到 25 万。

一直以来，爱尔兰教育的关注点就是扩大入学机会。1967 年政府实施的中等教育免费政策促进了第一波的教育改革。但是，爱尔兰高等教育仍然未受其他政策因素的影响。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爱尔兰经济快速发展导致劳动力短缺和国际竞争产生新的趋势。1995 年取消本科生学费政策对高等教育变革又起到了重要作用。爱尔兰现在的所有政策文件、国家战略都与高等教育、知识经济、全球竞争力相联系。虽然政府仍然要求高等教育要提高到 72%的入学率，但质量和卓越性的目标是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动力。

高等教育的新愿景

发表于 2011 年的《爱尔兰高等教育国家发展战略（～2030 年）》（The National Strategy for Irish Higher Education to 2030 ）文件介绍了有关高等教育改革的提议，其中包括终身学习、全职和兼职学习模式之间的平衡以及高等教育国际化。具有争议的部分：在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和现代化方面，高等教育局被赋予更加重要的角色。通过战略性对话并确立制度合同（institutional contracts），所有的高校组织将受到更广泛的监督，同时高等教育机构合理化和多样化的双重目标促使爱尔兰通过合并比较大型的技

术类学院来建立一些新型工科大学。

爱尔兰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目前仍在讨论当中。2012 年公布的《直通未来高等教育前景》（Towards a Future Higher Education Landscape）文件提出了“高等教育协调体系”（co-ordinated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的指导原则和目标，并强调高等教育使命的独特性。由于经费和竞争的压力，没有哪一所教育机构能覆盖所有学科或所有研究领域。未来高等教育体系的划分将会依据质量水平、学科特色、项目定位、区域参与、学生概况、教育提供方式、研究密度和特色等因素。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合作、联合和合并受到鼓励，以便减少重复办学，确保更高的办学效率、质量以及资金价值。

截至 2012 年 7 月 31 日，每所高等教育机构必须明确自身将如何适应这一新的高等教育愿景，如何发挥独特作用以及是否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合并等问题。希望升级为工科大学的技术类学院还需要确定自身的发展战略。各高等教育机构的所有提议将会由一个国际专家小组进行审核——各个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战略如何和谐地融合在一起，以提供一系列的教育项目和研究使命——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人口发展趋势并能顾及当前高等教育的经费因素。2012 年底，高等教育局将制定爱尔兰高等教育“蓝图”，里面涉及：在接下来的 10～20 年间爱尔兰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包括机构数量、类型和区域分布等。

可持续发展

爱尔兰高等教育是一个由公共资助的体系，这个资助体系在各个方面也存在问题。由于人口因素和替代性就业机会的减少，高校学生人数猛增；但是自 2007 年来国家对每位学生的资助几乎减少了 20%，至 8000 欧元。每位本科生每学年所交学费从 2008 年的 900 欧元增加到现在的 2000 欧元，截至 2015 年将上升到 3000 欧元。爱尔兰高等教育有学生补助制度，但没有学生贷款制度。所有的研究生都必须交学费。

可持续发展是爱尔兰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只有少数高等教育机构能成功获得慈善、商业等替代性资源。如果公共资助持续减少的话，高等教育机构将不能提供充足的、以确保高等教育质量所需的经费。现任政府于 1990 年取消学费，2011 年也重申反对重新建立学费制度。政府也在考虑各种替代性方案，包括从具有支付能力的家庭中获取更高的学费收入，从各式项目中获取多样收入，允许各高等教育机构通过市场活动获得收入，在国家或高等教育机构层面上减少学生数量，加强私人资助的作用等等。

优先发展科研

2000 年之前，爱尔兰还没有国家层面上的促进科研发展的政策、投资战略，在科学研究上不具有国际声誉。那时，爱尔兰高等教育尽管获得了大量投资，但是高等教育经费仍然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远低于许多国家的平均水平。尽管如此，截至 2009 年，在 20 个国家的比较中，爱尔兰的科研成果影响程度列第八位。爱尔兰遭金融危机袭击时，研究经费在 2009～2010 年间减少了将近 30% 的财政支持。从这时起，爱尔兰政府一直在努力维持并增加研究和发展经费。

爱尔兰企业、职业与创新部（the Department of Enterprise, Jobs and Innovation）在 2010～2011 年期间，开展了“研究优先次序运动”（A Research Prioritization Exercise），旨在确定高等教育研究基金和活动的战略框

架。爱尔兰自然科学基金（Science Foundation Ireland）是以信息通信技术、生物科技、能源研究领域作为资助对象，其他机构则鼓励“自下而上”（bottom-up）的研究资助方法。“研究优先次序运动”标志着爱尔兰高等教育自由放任发展时期的结束，同时要求建立强大的人才库，以支持保障“自上而下、目标性研究”，强调研究要与社会、经济需求直接相关。

后续的运动开展过程已经评选出 14 个研究领域和六个科学技术平台。每一研究领域的评选都依照四个高标准进行：爱尔兰企业在全球市场中是否具有实际竞争力；公共投资在研究开发过程中是否是必要的，能否与私营机构的研究互补；是否已经具有可观衡量的优势；以及所研究的领域是否是爱尔兰发展中必须应对，同时又能反映国家和全球性挑战。在爱尔兰，艺术、人文、社会科学的关注度不足——除了少部分“为知识而研究”（research for knowledge）或为“政策而研究”（research for policy）的领域。

研究相关性通过两阶段的评估过程得以巩固。在第一阶段，每一个方案都将会根据以下标准进行筛选：与优先研究领域的符合度，研究结果的明确性，在适当情况下最终用户的参与情况；在第二阶段，达到上述三个标准的方案将要接受国际同行评估小组按照研究的卓越性、创新性标准进行评审。通过了这两阶段评估的研究方案将获得公共竞争性基金的 80%，从而以确保各研究机构和项目的一致性。

爱尔兰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爱尔兰高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尽管不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它代表了当今高等教育体系和研究体系逐渐转向由政府更多引导的趋势。在世界各国热衷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时期，强调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效率是有意义的，但这会阻碍高校机构自身的发展策略和高校机构的自主性。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的时代，假如国家对大众化的公共高等教育资助的能力有限，那么营利性教育机构有助于缓解高等教育压力，但是它也将改变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特点。强调以短期就业岗位创造和创新性为中心的相关研究，对研究和高等教育体系结构、教育项目、学生学术生涯来说具有意义。这代表了高等教育由巩固社会人力资本发展的角色转化成国家产业政策的工具。爱尔兰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有些会对高校机构质量的特色化产生积极影响而不是纯粹强调高校的全面性，但也能同样地影响学科发展的广泛性和平衡性，以及爱尔兰高等教育对国际学生和国际投资的吸引力。因此，爱尔兰提供了有趣的研究案例。